

德国经济治理中的稳定文化

——评《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

郑春荣

内容提要:《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一书深刻揭示了战后德国经济增长与其货币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文结合对该书的点评,重点从理念、制度和日常政治层面论述了德国经济治理中的稳定文化,指出这种文化是德国马克成为“欧洲稳定锚”、并成功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 德国 经济治理 稳定文化

《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一书汇聚了德国货币政策领域知名学者和实践家的智慧,向读者重构了围绕德国货币政策制定与调整过程的讨论,深刻揭示了战后德国经济增长与其货币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并非专门研究德国经济的,但是拜读此著,获益良多,诸多困惑也理出了一些头绪。此书的三位主编分别是欧洲研究领域、企业界和经济学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对众多德语文献进行了缜密挑选和梳理,在此对他们的付出与贡献表示我深深的敬意。

应该说,本书的出版正当其时。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正如编者所指出的,目前我国人民币面临不断升值的压力,德国马克升值的应对措施和国际化路径或许可以成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有益借鉴。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德国马克的升值并未导致德国出口的萎靡,相反,渐进的升值增加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压力,进而促使它通过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研发来保持竞争优势。^①其次,在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讨论这个议题更具现实意义。

^① 参见[德]见托尼·皮伦肯珀尔:“导论 联邦德国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1948~2000)”,周弘、彼得·荣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欧债危机发生之后,德国人无限怀恋曾经给他们带来经济增长与富裕的德国马克。在2011年9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有近一半的德国人希望恢复德国马克。^①虽然默克尔总理的“欧元亡、欧洲亡”的告诫并非过于危言耸听,但是,危机发生以来,在德国,始终存在要求德国退出欧元、恢复德国马克的呼声。

在笔者看来,德国国内的这种声音,固然与德国民众不愿意为南欧国家“懒散”之人买单有关,但是,也与他们对德国马克的信任相关。这种信任常常被称作“稳定文化”或“反通胀文化”,这是一种在德国社会深深扎根、对币值稳定目标的认同。^②默克尔总理在欧债危机应对中坚持紧缩计划和整肃财政纪律,虽然为此在欧盟其他成员国中饱受批评,但事实上,她的这一行为也是受到了这种稳定文化的影响,^③得到了德国民众的拥护。

由此可见,德国的稳定文化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对德国精英的政策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借用简·库依曼(Jan Kooiman)提出的对治理的分阶分析法^④,来重点阐述德国经济治理中的稳定文化。在库依曼看来,治理可以区分为一阶治理(first order governing)、二阶治理(second order governing)和三阶治理(third order governing)或者元治理(meta governing)这三个层阶。其中,三阶治理指的是形成判断治理是否恰当的一组规范标准;二阶治理涉及制度的建立和维持,主要关注治理互动的结构性因素;一阶治理指的则是治理的行为体如何在日常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一分析框架的优点在于,它不仅能很好地剖析每一个治理层阶的特点(包括公私行为体的互动方式),而且可以剖析这些层阶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这一分析框架相对应,笔者试从理念、制度和日常政治三个层面分析德国的稳定文化,以期对此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① 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eu-umfrage-jeder-zweite-will-die-d-mark-zurueck_aid_670457.html, last accessed on 12 June 2012;也可参见[德]曼弗雷德·J·诺曼:“币值稳定:威胁与考验”,周弘、彼得·荣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第428页。

② <http://wirtschaftslexikon.gabler.de/Definition/stabilitaetskultur.html>, last accessed on 12 June 2012.

③ See Sebastian Dullien and Ulrike Guérot, “The long shadow of ordoliberalism: Germany’s Approach to the Euro Crisis”, *ECFR/49*, February 2012,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olicy Brief, http://www.ecfr.eu/page/-/ECFR49_GERMANY_BRIEF_AW.pdf, last accessed on 12 June 2012.

④ Jan Kooiman, *Governing as Governance*, London: Sage, 2003.

一 理念层面

德国 1967 年颁布的《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第 1 条对德国宏观经济目标做了如下规定:德国的宏观经济需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实现持续、适度的经济增长,同时确保物价稳定、高就业率和外贸收支平衡。^①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魔力四角。

但如何实现上述目标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因为这些目标之间并不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而是互有制约和掣肘,而其中与其他目标最易产生冲突的就是物价稳定这一目标。

物价稳定理论上的定义是指货币的价值没有发生改变。^②在实际应用中,德国联邦银行规定:当物价的涨幅处于 0% - 2% 之间,可以视为物价稳定。^③与之相类似,欧洲中央银行也如此定义物价稳定:在欧元区,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相较于上一年增长在 2% 以内的,可认定为物价稳定。^④

在德国学者看来,物价稳定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维系着社会安宁和市场经济的运转。^⑤对于个人来说,如果物价稳定不能维持,其创造的财富和积蓄将会受到侵蚀;而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转来说,物价是商品生产的信号器,在总体物价水平稳定的情况下,某商品如果价格上升,则会刺激该商品的生产,反之则限制该商品的产量。但在通货膨胀的局面下,上涨的物价会带来需求量上升的错误信号,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社会资源遭到浪费。

但具体落实到经济政策上,二战后由于西方国家百废待兴,它们大都通过大规模的国家投资,人为地刺激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因此,财政政策,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被置于许多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首位,而货币政策只是财政政策的补充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许多国家,政府总是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但

① Gesetz zur Förderung der Stabilität und des Wachstums der Wirtschaft, Art. 1,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bundesrecht/stabg/gesamt.pdf>, last accessed on 12 June 2012.

② Christian-Uwe Behrens, *Makroökonomie Wirtschaftspolitik*, München: Oldenbourg, 2004, p. 221.

③ Deutsche Bundesbank, *Deutsche Bundesbank*, Frankfurt am Main, 1998, S. 60.

④ 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Frankfurt am Main, 1999, S. 51.

⑤ Claus Köhler, *Preisstabilität und Vollbeschäftigung in einer globalen Wirtschaft: Der Beitrag einer potentialorientierten Geld- u. Kreditpolitik*, München: Verlag Moderne Industrie, 1996, S. 53.

遭受战争创伤最深的德国却与之相反,其社会市场经济理念非常警惕积极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赤字,因为为弥补赤字所通常采取的印钞票和发债券的方式,最终都将导致通货膨胀。德国总是赋予稳定的物价以最重要的地位。

德国之所以在物价稳定上的立场与众不同,一方面是出于德国民众曾经遭受过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的切肤之痛;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理念。

首先,一战后,德国元气大伤,生产水平急剧衰退。同时,战败让德国不得不承受远超其偿还能力的战争赔款。面对国内财政赤字和国外巨额外债的巨大压力,德国政府只能以印钞票来缓解局势,这导致德国马克迅速贬值:1921年6月,美元对马克的比价是1:60,到了1923年9月,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160000000,普通民众顷刻之间失去了他们所有的财富。^①此次通货膨胀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而二战后,德国再次经历了恶性通胀的梦魇,经济的混乱让帝国马克成为废纸,黑市猖獗,香烟代替纸币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货币,喜爱存钱的德国老百姓的毕生积蓄再次化为乌有。可以说,这两次德国历史上罕见且时间间隔如此之短的恶性通胀深深扎根于包括阿登纳、艾哈德这些后来联邦德国建国者的整整一代人苦涩的集体记忆中。

有一份问卷调查比较了德国与美国民众对政府在反通胀中角色的看法,其结果也能折射出德国人对反通胀的重视:对于“控制通胀是否为政府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个问题,有76%的德国人完全赞同、18%的德国人赞同(美国分别为56%、28%)。如果分析1940年前出生的受访者,则有90%的德国人完全赞同、8%的德国人赞同(美国为69%、13%);但即使在1950年后出生的德国人中,也有51%完全赞同、40%赞同(美国则为44%、38%)。由此可见,反通胀在德国已经是一个跨代际的共识。^②德意志联邦银行前行长汉斯·蒂特迈尔的一番表述,也与此相呼应:“1923年的通货膨胀对我们国家未来命运的走向有着恶劣的影响……以稳定的货币为目标,这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社会。这基于社会各阶层民众广泛的共识,这基于一种稳定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民众——尤其是在特殊时期——一次又一次坚定地拥护以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

① [瑞]埃里克·艾克:《魏玛共和国史》,王步涛、钱秀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0页。

② Robert Shiller, “Why Do People Dislike Inflation?”, in Christian D. Romer and David H. Romer eds., *Reducing Inflation: Motivation and Strate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 1-53.

策的原因所在”。^①

其次,深深影响德国二战后经济政策的弗莱堡学派及其秩序自由主义理念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弗莱堡学派领军人物瓦尔特·欧肯的核心理念所依据的一项重要原则即是货币币值的稳定。欧肯的一句话深入人心:一种稳定的货币不是一切,但一切都是由于有了一种稳定的货币。对于欧肯来说,市场经济适用如下原则:如果一定的币值稳定不能保证,那么所有落实竞争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此,对于竞争秩序来说,货币政策占有首要地位。^② 稳定政策的成败不仅关乎单个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更关乎社会市场经济的维持。社会市场经济基于的前提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而完全竞争理论分析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稳定公正的市场秩序,稳定公正的市场秩序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物价总体水平保持不变。完全竞争模式中所分析的产品与生产要素价格,实际上都是物价总水平不变条件下的价格,即相对价格水平。要使完全竞争理论中所说的价格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就必须保持物价总体水平稳定。正因为如此,秩序自由主义者把自动保持物价总体水平的稳定作为竞争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稳定物价的关键又是货币制度。保持币值稳定是保证价格体制正常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有一套机制来自动稳定币值的货币制度是使竞争秩序具有内在均衡倾向的前提。另外,欧肯还认为,货币制度还应该像竞争秩序本身一样,尽可能自动地发挥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体制的公平性”要求货币的活动与一般经济活动遵循同一原则——只有这样,货币制度才能适应整个经济体制。而且,“因为经验表明……不了解情况、对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表现软弱以及错误的理论等,所有这些都会极大地影响这些领导者去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③ 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深受欧肯思想的影响,把物价稳定放在不容置疑的首要位置,他说,“经济问题并不在于物价该不该稳定,也不是在于某些条件下该不该听凭物价上升。物价水平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稳定。问题只在于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来做到这一点”。^④

^① Hans Tietmeyer, “Fifty Years of the Deutsche Mark—a Currency and its Consequences”, Jens Hölscher ed., *Fifty Years of the Deutsche Mark*, London: Palgrave Publishers, 2001, pp. 7-12.

^② [德]奥特玛·伊辛:“经济政策目标冲突下的货币政策”,周弘、彼得·荣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第95页。

^③ [德]瓦尔特·欧肯:《经济政策的原则》,李道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页。

^④ [德]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祝世康、穆家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5页。

综上所述,可以说,德意志民族不堪回首的沉重记忆以及政治与经济精英的深刻思想造就了德国坚定不移的币值稳定和反通胀理念。后来在20世纪60、70年代得到货币主义思想支持的这一理念,^①确定了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以及后来的欧洲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框架。

二 制度层面

德国马克因其币值的稳定而享有盛誉,而作为德国中央银行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因其一直有效地维护着德国马克币值的稳定而备受推崇。但在如何维护币值稳定的问题上,事实上,德国历来的中央银行走过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

德国最早的中央银行——德意志帝国银行于1876年成立,在组织架构上,帝国银行的董事局直接受国家领导,帝国政府通过成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银行管委会”监督帝国银行,帝国首相任管委会主席。这一组织架构确保了国家对中央银行的决定性影响。随着第二帝国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中央银行成为其筹集资金的急先锋,最后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通货膨胀的道路。这一时期,中央银行实际上已经沦为财政部的一个下属机构。

1923年灾难性的恶性通胀促使魏玛政府进行货币改革。有了第二帝国的惨痛教训,1924年通过的《银行法》明确规定帝国银行是独立机构,不受政府约束。同时,严格限制政府向银行借款。这些规定都可看做是为了避免通胀所做的努力。

但这些举措随着希特勒的上台而失去意义。1933年的《银行法修正案》将委任银行行长和董事会的权限交给了帝国政府总理。1937年,帝国银行的独立地位正式被取消,银行董事会直接由政府总理领导,在此期间,帝国银行再次沦为希特勒实现个人野心和德国侵略扩张的工具。1939年,由于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警告希特勒无休止的扩大支出将导致通货膨胀的后果,连银行董事会都被希特勒废除了。

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随着货币改革的实施,德国马克取代已成废纸的帝国马克,兑换比例是100帝国马克换6.5德国马克。同年,德意志帝国银行也取

^① Karl Kaltenthaler, “Evolution of the German Bundesbank: from Bank Länder to regional bank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in James Sperling ed., *Germany at fifty—five Berlin ist nicht Bonn?*,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49.

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德意志各州银行(BdL)——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前身。有过两次前车之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毫无争议地成为最根本的原则。1948年的《军政府法》第1条第3句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不听命于除法院之外的任何政治团体或者公共部门。^①

此时,德国中央银行体系还是由各州中央银行和德意志各州银行所组成的两级体制。直到1949年《基本法》第88条规定,联邦应设置一发行货币及币券之银行作为联邦银行,统一的中央银行筹建工作才开始展开,至1957年,《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将之前的银行体系合并、改组,建立了一个完全统一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

在德国中央银行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贯穿其发展变迁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对于独立的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德意志各州银行董事会主席威廉·沃克一语中的:货币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②

显然,在德国学者看来,中央银行一旦不能独立于政府,那么政府可以在任何需要资金的情况下求助于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也必须遵从政府的指令提供资金,若资金需求量较大,或者自身资金不充足,印发钞票将是唯一的选择。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向所有的人征收了一种税,即通货膨胀税,通过悄无声息的方式掠夺民众的财富,同时造成市场秩序混乱。而独立的中央银行则可以完全不听命于政府,严格执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政策。

赋予德国中央银行独立地位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法》里有几个重要条款值得认真研读。该法第3条规定:联邦银行依此法令赋予的货币政策职权,以稳定货币为目标,调节货币流通总额和国民经济的信贷供应,同时负责国内外收支往来的银行清算工作。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基本任务就是稳定货币。

同样,联邦政府和联邦银行的互动关系也值得关注。该法第12条规定:联邦银行有义务在完成其任务的前提下支持联邦政府的一般性经济政策。在根据本法令行使职权时,不受联邦政府指令的约束;第13条规定:联邦银行和联邦政府在重大货币政策问题上需进行磋商,联邦政府有权出席联邦银行的理事会会议,有权提出议案,但无权表决。由此可以看到,联邦政府和联邦银行之间的关

^① [德]曼弗雷德·J·诺曼:“币值稳定:威胁与考验”,第407页。

^② 同上书,第401页。

系是建立在相互独立基础上的协商合作的关系,双方共同致力于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而联邦银行最根本的使命是保护货币。

此外,《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20条对联邦银行对联邦政府的最高贷款额度也做出了限定:60亿马克,以避免联邦银行成为联邦政府的永久提款机而出现财政赤字,危及货币的稳定。

除了法律上独立的地位和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外,德意志联邦银行最高程度的独立性还体现在其领导层的完全独立。

从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来看,德意志联邦银行理事会(Zentralbankrat)由其董事会成员和各州中央银行行长组成。在资格方面,要求相关人员有极其专业的从业资格,以保证其领导层的去官僚化(第7条第2款);在法律地位方面,联邦银行拥有联邦层面直接的公法法人地位,理事会和联邦各部同级,^①州中央银行和联邦银行设置的主要办公室也具有联邦行政机构的地位(第29条第1款);在任期方面,理事会所有成员的任期为8年,可连任(第7条第3款),较长的任期有助于个人决策的独立性,而且一般来说,进入联邦银行理事会是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这样就可以排除影响以后职业生涯的政治因素;^②在任命方面,理事会成员由联邦政府提名、联邦总统任命(第7条第3款),而各州中央银行行长则由联邦参议院及各联邦州的州政府提名(第8条第2款)。这种制度安排也体现出德国联邦制的特点,多元化的提名机制弱化了联邦政府的影响力;此外,成员替换时间也交错进行,以避免某一时期集中大规模替换而受到政治的影响。

正是这样完善的法律规定赋予了联邦银行有效的独立地位,由独立的公职人员所领导的独立的中央银行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为德国物价稳定创造了制度上的前提。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许多学者认为,拥有独立中央银行的国家自然就会奉行以价格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③但事实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只是维护稳定文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其中非常重要的还有中央银行家们的远见卓

① Deutsche Bundesbank, *Die Geldpolitik der Bundesbank*, Frankfurt am Main, 1995, S. 17.

② [德]曼弗雷德·J·诺曼:“币值稳定:威胁与考验”,第409页。

③ Alex Cukierman, *Central Bank Strategy, Credibility, and Independence: Theory and Evid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Silvia Maxfield, *Gatekeepers of Grow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识,他们秉持只有价格稳定才能创造最佳经济结果的理念;之所以要特别强调中央银行家们的角色,是因为他们相对于谋求再次当选的政治家们更具长远眼光,而相对于普通民众,他们又拥有所需的专门知识。哪怕说中央银行家们捍卫稳定文化以及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其机构自身利益的考量,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是稳定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传承者。^①

三 日常政治层面

为了维护货币稳定,法律赋予了联邦银行独立的地位和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的权限,但是,稳定的物价能否就此高枕无忧?

在德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屡次出现联邦政府经济发展目标和联邦银行物价稳定目标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是以何种方式解决的,则耐人寻味。

上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开始腾飞,鉴于德国产品可靠的质量、世界市场的旺盛需求和德国马克较低的对外币值,德国从1952年起就产生并累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连年的巨额顺差导致德国经济出现了一个三角矛盾:容忍贸易顺差会产生大量外汇,大量外汇涌入导致“输入型通胀”,危及币值对内稳定;为了维护物价稳定必须减轻“输入型通胀”的影响,实现外贸收支平衡,而当时实现外贸收支平衡的唯一途径就是让马克对外币值升值;而马克升值又会极大削弱德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对极度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有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这样,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之间就产生了无法两全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早在1953年,各州银行就在其业务报告中表示了鲜明的立场:如果出现冲突情况,内部稳定具有优先权。^② 但此后的几年里,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得到了极佳的兼得,这主要得益于朝鲜战争结束和贸易进一步自由化导致的国际市场价格回落;在普遍稳定的氛围下,工会遵循温和的工资政策。由此,联邦银行不难通过货币及利率政策保持国际收支平衡。^③

但到了1957年,“输入型通胀”再次成为困扰德国经济的问题,经济部长艾

① [德]曼弗雷德·J·诺曼:“币值稳定:威胁与考验”,第428页;See also Karl Kaltenthaler, “Evolution of the German Bundesbank: from Bank deutscher Länder to Regional Bank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pp. 348–368.

② [德]奥特玛·埃明格尔:“内外(经济)平衡冲突下的德国货币与汇率政策”,周弘、彼得·荣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第112页。

③ 同上书,第116页。

哈德从1956年起就一直主张通过马克升值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但以总理阿登纳为首的其他政府官员则反对这一做法。尤其是1956年5月,为了控制日益增长的通胀威胁,德意志各州银行将贴现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从4.5%提高到5.5%),践行了自己优先考虑内部稳定的诺言,对此阿登纳极为不满,甚至在公共场合发表了著名的“断头台演讲”,他说:“德国经济景气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断头台落向了平民大众,我为此感到极为悲伤”。^①但由于此前德意志各州银行在稳定物价方面做出的成就,阿登纳的这番演讲并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②在这场争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深受弗莱堡学派影响的艾哈德坚持物价稳定的目标,而阿登纳更加倾向于经济发展而忽视通货膨胀的后果。最终艾哈德赢得了这场争论,1961年3月,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比值由4.2:1上升了5%,提高到4:1,缓解了外贸收支失衡和通胀压力,走上了德国马克的升值之路。德国马克的首次升值清晰地表明了对内币值稳定的优先权,并由此将通过货币升值实现内部稳定的对外经济保障原则引入了国际货币政策中。^③

1963年阿登纳下台后,艾哈德继任其总理职位,这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手握政治大权后更是一切以物价稳定为目标,奉行紧缩政策,不惜以牺牲其他经济目标为代价。但随后到来的德国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使其政策失去了支持,即使是他一直看重的通货膨胀率也在1965年和1966年连续两年超过3%,这是二战后的头一次,艾哈德不得不黯然辞职。此时,“经济奇迹”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走到尽头,德国经济步入下行通道。此后,在经济部长卡尔·席勒的领导下,德国经济政策全面转向凯恩斯主义,对包括物价稳定在内的几大宏观经济目标进行通盘考虑。结果就是1967年6月制定的《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此法试图以“启蒙”的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推动全面经济调控、制定目标方案设想、建立协调联邦、各地区实体和各行业协会之间行为的机构和编制多年的财政计划。^④这是一部具有时代转折意义的法律,标志着德国从之前

① [德]奥特玛·埃明格尔:“20世纪50年代德国马克的困境:欧洲通货膨胀的差异”,周弘、彼得·荣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第167页。

② Robert L. Hetzel, “German Monetary Histor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he Deutsche Mark to the Euro”, *Economic Quarterly*, Vol. 88, Winter 2002,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p. 37.

③ [德]奥特玛·埃明格尔:“内外(经济)平衡冲突下的德国货币与汇率政策”,第112页。

④ [德]克里斯蒂安·瓦特林:“全面经济调控和收入政策——对《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的考验”,何梦笔主编:《秩序自由主义——德国秩序政策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

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转向稳定和增长并重,其第1条(见前文)就表明,德国政府应该对几个比较主要的宏观经济目标进行综合权衡,物价稳定依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在这样的理念主导下,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危机随即克服,通货膨胀率也成功地回落到2%以内。

尽管如此,1965年以来的“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一直存在。1968年9月,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会向席勒建议调整汇率以保持稳定,被席勒拒绝,但对马克再次升值的预期使得在德国国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投机行为,大量外币的涌入加剧了通货膨胀的风险。最终,马克升值直到1969年10月新的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上台才得以实现,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比值再次上升9.3%,由4:1调整为3.66:1。但这次经过漫长内政斗争后姗姗来迟的升值没能挽回局面,全面的通货膨胀已经铺开,1970年的通货膨胀率由一年前的1.8%翻番至3.6%,1971年又飙升至5.1%,1973年到达7.1%的顶峰,联邦德国迎来了其成立后至今最为汹涌的一波通胀狂潮(当然,也必须看到,此次通胀也深受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影响)。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德国对美元实施浮动汇率制。直至1979年3月欧洲货币体系的引入,德国马克经历了相当喧嚣的6年。需要说明的是,依据欧洲货币体系最初的设计草案,联邦银行有可能会失去对货币供应量扩大的控制权;在艰难的谈判中,中央银行理事会成功地修改了该草案,尤其是从当时的联邦总理施密特那里争取到了秘密承诺,即只要必需的干预行动会严重威胁联邦银行维护价格稳定的任务,联邦银行就有权单方面中止这类干预行动。因此,在欧洲货币体系中,联邦银行也并未偏离其既有的货币政策。结果是,德国在80年代成为通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通胀率保持在6.3%(1981年)和-0.1%(1986年)之间,从90年代中期开始更是跌至2%以下。^①由此,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体系中逐渐赢得了主导地位,其他欧洲国家——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接受了德国马克作为“欧洲稳定锚”的角色。^②

总体而言,尽管德国的稳定目标出现过几次偏差,导致过几次较严重的通胀

^① Werner Lachmann, *Volkswirtschaftslehre 2: Anwendungen (Springer-Lehrbuch)*, Berlin: Springer Verlag, 2004, S. 226.

^② Manfred J. M. Neumann, “Die deutschen Währungen im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sgefüge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Historisch-Politische Mitteilungen*, Heft 5/1998, S. 224; See also Hans-Eckart Scharrer, “Vom Besatzungsland zum europäischen Stabilitätsanker”, *Wirtschaftsdienst*, 1998/VI, S. 319–322.

周期,^①但从纵向的历史来看,德国大多数年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都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从1950年至1995年,德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低至2.87%,^②这在23个主要工业国家里是最好的水平。反观其他欧洲国家,例如英国在战后一直饱受高企而又起伏不定的通胀率困扰,尤其是1975年和1980年通胀率分别达到了26.9%和21.7%的高位;法国在1973-1983年的十年间,通胀率也浮动在8.5%至15%之间;意大利则从1960年开始长期处于通货膨胀状态。^③相比这些国家,德国基本上保持了半个世纪的物价相对稳定。

从德国战后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尽管德国中央银行在致力于稳定物价方面一直不遗余力,但如前所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物价稳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也是因为联邦银行只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控制流通的货币规模,进而保持物价稳定。但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币会进入本国市场,这既有国际贸易导致的,也有投机导致的。这种方式所产生的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无法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解决,而只能通过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来平衡;而一旦政府倾向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的目标就会产生偏差。所以说,以货币稳定为首要目标的德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在国内外宏观经济条件下联邦政府和联邦银行合力的结果,这也是联邦政府和联邦银行各自相互独立但又协商合作互动关系的真实体现。

四 结语

二战结束后,德国经济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而币值的坚挺也给德国马克带来国际声誉,德国马克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常年保持在15%左右。^④德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基于其所一贯推行的以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

① 1971-1975年、1980-1982年和1991-1993年,分别与战后西方国家历次经济危机相对应,1991-1993年还有两德统一后大规模支持东部建设导致财政赤字升高的因素。

② [德]雅各布·A·弗兰克尔、莫利斯·格德施坦因:“德国马克的国际角色”,周弘、彼得·荣根、朱民主编:《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第228页。

③ 陈湘永:“西欧主要国家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及其比较”,《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1期,第50-52页。

④ [德]雅各布·A·弗兰克尔、莫利斯·格德施坦因:“德国马克的国际角色”,第228页。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德国形成这种稳定文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德国民众及其精英对历史上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及经济思想家的经济治理理念。这种稳定文化不仅落实到了制度保证中,而且也反映在日常的政策选择和经济治理的决策中。试想,若无此深植于德国社会之中的稳定文化,那么危机袭来,民众可能反而会要求政治精英为了经济发展而对通货膨胀报以侥幸的态度,这将导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受到侵蚀,稳定文化的制度性因素被瓦解;而且,若无此稳定文化,德国历史上或许就不会对通货膨胀采取近乎零容忍的态度,也不会对维持币值有如此强烈的意识。

德国马克的50年,使之成为了稳定的象征。翻阅《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一书,即可发现,虽然该书涉及货币政策与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的关系,但对币值稳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几乎渗透在文集作者的每一篇文章中。捍卫币值稳定,这是德国马克成功的精髓,也是文集给笔者最大的感悟。

然而,此刻,合卷而思,仍觉意犹未尽。在笔者的脑海中,还有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这都涉及上述“德国经验”的扩散:其一是它在欧洲范围的传递;其二是它对欧洲以外国家,包括我国的货币政策及其实践的启示。不过,与其说这是文集的缺憾,倒不如说是文集编者想要留给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空间。

首先,众所周知,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效仿了德意志联邦银行,这不仅表现在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物价稳定目标的落实上,也体现在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结构中。但笔者在这里想到的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不能(仅仅)解读为欧盟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对德国放弃马克的让步,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联邦银行在维持价格稳定中的成功以及德国战后良好的经济表现使得欧盟其他国家的意识,即币值稳定不仅是可以实现,而且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有了进一步提高。同样,在当前欧债危机中,德国强调价格稳定与财政纪律的立场总体上得到了贯彻,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德国经济治理理念的说服力使然。^①但是,德国货币政策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宪法或法律的规定是一回事,但实践又是另一回事。联邦银行的历史表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币值稳定目标需要不断地去捍卫,以抵制来自政治方面的要求。这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取得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

^① 参见郑春荣:“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5-6页。

取决于中央银行家们是否身体力行地去说服、去捍卫。^① 这一点也清晰地表现在围绕着欧洲中央银行在当前欧债危机应对中角色的争论中。同样,与此相结合,我们也能很好地理解,为何偏偏德国中央银行家们一再反对欧洲中央银行购买危机国家国债的计划,甚至不惜以辞职相威胁;虽然他们作为欧洲中央银行中央理事会里的孤独者,并不能阻止相关决议的通过。^②

其次,德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当年德国相类似的今日中国的借鉴价值,这里无需再赘言。^③ 笔者只想指出,德国的稳定文化对于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殊不知,当年德国对马克国际化的热情并不高,甚至于德国的相关政策是抵制马克国际化的。^④ 德国人的担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担心国际化会引发德国马克升值,继而损害德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二是担心会失去对当时还处在完全规制下的金融体制的控制,从而使得德国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模式在国际化过程中走向瓦解。^⑤ 之所以德国马克最终走向国际化,主要是因为外国人想要持有德国马克,而不是德国有关当局积极谋求的结果。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的分析所指出的,决定货币国际化的基本面因素包括经济规模、投资者对货币的信心以及金融市场的深度等三个方面。^⑥ 可见,币值的稳定和对货币价值的信心是一种货币成功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责任编辑:莫伟)

① Manfred J. M. Neumann, “Das Vermächtnis der D-Mark für den Euro”, *Wirtschaftsdienst*, 1998/VI, pp. 322-326.

② Wolfgang Proissl, “Bundesbankpräsident gegen Anleihenkäufe. Jens Weidmann, der EZB-Abweichter”, *Financial Times Deutschland*, September 6, 2012, <http://www.ftd.de/finanzen/maerkte/bundesbankpraesident-gegen-anleihekäufe-jens-weidmann-der-ezb-abweichter/70087095.html>, last accessed on 12 December 2012; 另可参见徐聪:“从欧债危机看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困境”,《欧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5-32页。

③ 参见周弘:“德国马克的平衡术”,《北京日报》2012年11月26日,第020版。

④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1979年,伊朗当时考虑将其美元储备转成德国马克,但联邦银行提醒伊朗不要这样做。See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7.

⑤ Sebastian Mallaby and Olin Wethington, “The Future of the Yuan: China’s Struggle to Internationalize Its Currenc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1, 2012, pp. 135-146.

⑥ Jeffrey Frankel,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nd Historical Preced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Vol. 27, 2012, pp. 341-343; 中译文参见 Jeffrey Frankel:“人民币国际化:历史经验”,《金融发展评论》2012年第3期,第1-11页。